

中国计量大学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国内学科建设发展动态

【2016年第3期（总第12期）】

中国计量大学发展规划处编印

2016年10月10日

目 录

【学科评估与排行】

1. 不搞排名的学科评估走向会怎样.....3
2. 科研评价应遵循什么基本原则——“A类期刊”与莱顿宣言、旧金山宣言的对话.....6
3. 从QS排行榜谈高等教育全球变化趋势.....11

【“双一流”建设】

4.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国内态势.....14
5. “两个一流”：当利益遇到理想.....21
6. 从“大者通吃”走向“特色取胜”.....28
7. “一级学科”能等同于“一流学科”吗.....32
8. 中国大学对“世界一流”执念太深、焦虑太重.....38

【高教视点】

9. 张尧学：大学究竟该办成什么样子？.....48
10. 什么是“伟大”的大学？.....54

不搞排名的学科评估走向会怎样

第四轮学科评估开展至今，引起各方极大关注和响应。然而随之出现的一些现象，如：一些高校内部学科间为争夺资源而“交战开火”，有的学校“大刀阔斧”关停并转那些无望进入前茅的学科，如此种种，着实令人担忧。

事实上，因学科评估而起的纷争大多源于对评估结果的非理性的“绝对化”解读。即：参与评估的各方似乎都认为，评估结果将直接挂钩国家“双一流”建设，而且学科排名相差一二，国家投入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此情形下，学校会否因用力过猛而做出非理性抉择？学科团队会否因过度焦虑而无心苦练内功？如是，那么保证质量、以评促建岂不是句空话？弄不好，还可能会得不偿失。

为何不考虑不做过于量化的评估结果，从而让那些把学科排名“绝对化”的看法以及把评估结果和财政拨款“绝对化”捆绑的做法无从下手，局面又会怎样？笔者认为，至少会有以下四方面的改观：

其一，评估活动更彰显内涵价值。学科评估没有精确的量化结果和名次高低，随之的结果使用也会受限，看似把它从“神坛”上拉下，其实这正是学科评估科学性和合理性的体现。复杂的学科评估本身就不存在精确的量化评判，它更多只是对学科质量和人才培养的监控和保障底线，把它作为学科水平、名次之争的工具，表面上抬高了学科评估的身价，

实质上这是学科评估本身无法承载的。更何况，本轮学科评估正处于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尚未明朗时期，离开“绝对化”表达形式，更能彰显评估活动自身的水准和价值。

其二，学科评估回归以评促建本位。学科评估和其他外部评估一样，都是在一定参评对象、评估标准下对学科状态的呈现和评判，它在于帮助参评学科在相互比较中知己知彼，从而能够更迅速、准确找到各自学科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树立标杆，有的放矢地建设与发展。这样的评估目的和作用需要在宽松、和谐的氛围下体现和实现，而现实是有些学科通过后期紧急筹措资源和成果以图评估名次效应尽快显现，在这种唯结果论的“烽火硝烟”下，轻则导致高校学科建设精力分散，重则还会引发“假大空”现象及学科间矛盾升级。为此，淡化评估结果或不推出量化结果，让硝烟散去，引导高教上下把兴奋点转移到学科建设本身上。

其三，教育财政政策更趋明朗化。国家教育财政政策自有其价值判断和执行规则。现阶段，大家普遍寻思：若真如传闻所言，国家将大额资金只集中到学科排名顶尖的学科，其效率效益何在？会否导致好的大学越来越好、弱的大学越来越弱？这样的投资策略是否有助于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强国迈进？有助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没有了学科评估定量结果的帮衬，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需要制定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体现管理水平教育财政政策，同时也把高校和社会大众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政策制定的内在逻辑和实际效

果上，这种良性互动将促进国家教育财政政策明晰和完善，同时也提高高校和社会大众对政府决策的评议和监督水平。

其四，高校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政府依法对高校实施宏观管理和监督指导、高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管理体制正逐步形成。理论上说，本轮学科评估，是国家依法治教形势下管办评分离实践的体现，它的宗旨也十分明确，那就是要服务于学校自我质量保障问责制度的开展，所以评估活动的重点更应体现在诊断上。没有了学科评估结果和排名的导向，客观上切断了长官意志、行政权力来左右学科发展的抓手，从机制上保障了学校根据自身优势和发展需要来统筹规划学科的决策权，其中根据学科发展的构成要素、渊源脉络及学科间的相互关系等来形成学校内部和谐、有序的学科生态群，这是非常需要学校作为办学主体而深入调研、精心布局的。

（《中国教育报》2016年9月5日 作者：樊秀娣）

科研评价应遵循什么基本原则 ——“A 类期刊”与莱顿宣言、旧金山宣言的对话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方案中的科研评价部分，特别是“A 类期刊”的增列与取消，一时成为热议话题。事实上，科研评价是世界性难题，最近几年，国际学术界提出了科研评价方面的两个“宣言”——“莱顿宣言”和“旧金山宣言”。放在世界的范围内，如何看待这次学科评估中某些新鲜尝试呢？有哪些可取之处和不足之处？“A 类期刊”的取消不意味着相应的探索和思考也被取消。

“莱顿宣言”纠偏“量化至上”

“莱顿宣言”（The Leiden Manifesto for research metrics）的提出源于 2014 年在荷兰莱顿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公共政策教授 Diana Hicks 等提出了合理利用科学评价指标的七条原则，后来扩充为十条，并于 2015 年 4 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莱顿宣言”的十条原则，简言之，第一，量化评估应当支撑质化的专家评估，而不是取而代之；第二，衡量绩效应基于机构、团队和个人的科研使命；第三，保护卓越的本地化的相关研究；第四，保持数据采集和分析过程的公开、透明和简单；第五，允许被评估者验证数据和分析；第六，考虑发表和引用的学科差异；第七，对个人研究的评价应基于其综合作品的质性评价；第八，应避免评估指标的的不当的具

体性和虚假的精确性；第九，识别认清评价指标对科研系统的影响；第十，定期审查评价指标并加以改进。

按笔者的理解，这十大原则可以归为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即总的原则是：基于指标的量化评估是第二位的，是辅助性的，而同行评价的质性评估是第一位，是主导性的。量化指标可以降低同行评价中的偏见，促进更加深入的审议，提高同行评价的质量，但量化指标不应取代评估者基于充分信息基础上的判断。评估者仍然需要对其评估负责，而不是完全让“数据说话”了事（第一条原则）。所以，“莱顿宣言”并不提倡科研评价要用量化指标，更不提倡把量化指标作为主导甚至是唯一指标。“莱顿宣言”只是说在用到起辅助作用的量化指标时需要注意的一些原则。

第二方面，在总的原则指导下，运用科研评价指标做具体评价工作时的下位原则，即要充分考虑到科研活动本身是创造性的、个性化的、独特性的等特点，所以需要在评价过程中特别注意科研活动的使命的差异（第二条原则）、地域性的差异（第三条原则）、学科性的差异（第六条原则）、个体性的差异（第七条原则）。这些差异容易被量化指标遮蔽，所以需要在评价中采用综合计量或者质性评估办法。

第三方面，关于科研评价指标的具体数据采集和分析的要求，要公开透明（第四条原则）、可以复核验证（第五条原则）。

第四方面，对科研评价指标的态度，要理解实质内涵（第

八条原则）、警惕负面影响（第九条原则）、不断改进完善（第十条原则）。

“莱顿宣言”每一条都内涵丰富，指向明确。与之对比，可以发现，我国科学评价工作还大有改进空间。

“旧金山宣言”纠偏“以刊评文”

“旧金山宣言”（The 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 DORA）的提出源于2012年12月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年会期间，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出版者提出关于科研评价的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旧金山宣言”，2013年5月，78个科学组织的155位科学家签署了这份宣言。“旧金山宣言”引发了世界科学界的广泛关注，《科学》杂志撰写社论支持“旧金山宣言”，认为影响因子最重要的危害是可能妨碍创新，它引导科学家关注发高影响因子的文章，追逐所谓的“热点”，而不是潜心科研创新。

“旧金山宣言”并不像“莱顿宣言”那样包含相当宽泛的内容，它只是针对期刊的计量指标（主要是期刊影响因子）而提出的，呼吁科学界停止使用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价科学家及其工作。内容包括总体建议以及对资助机构、研究机构、出版机构、计量指标提供机构以及科研人员的建议，共计18条。总体建议是：“停止使用期刊影响因子等期刊计量指标作为替代指标来评价单个研究论文或学者个体的贡献，或者是作为聘用、晋升、资助等方面的依据。”其他区分对象的建议都是围绕着总建议展开的。

期刊影响因子是 20 世纪 50 年代由汤姆森路透公司开发出来的，其最初提出的目的是为帮助图书馆评估和挑选决定订购哪种期刊，但是现在影响因子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评价个人和研究机构的水平和贡献。期刊影响因子的含义是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可见它只是期刊的评价指标，并非科研工作本身的评价指标，影响因子不具有对学术质量精确评价的功能，所以不能单凭影响因子就断言论文优劣。“旧金山宣言”倡导的就是评估科研工作要回归到科研工作本身的价值中去，而不是基于刊载的期刊。

“A 类期刊”弊大于利

回到开篇的话题。客观地讲，这次学科评估方案在完善科研评价方面积极探索，其价值取向和工作方向与“莱顿宣言”所倡导的内容是比较契合的。比如在评估方案和相关说明中，提出“学术论文质量”采用“三结合”评价组合。一是坚持质量与数量相结合，采用代表性论文，在“比总量”与“比人均”之间找到平衡点；二是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通过量化指标统计进行客观评价外，还通过“代表性论文”进行专家主观评价；三是坚持国内与国外相结合，要求包含一定比例的中文期刊，强化中国论文评价话语权。这背后的指导思想都是“莱顿宣言”提倡的摒弃“唯量化指标论”，采用更加综合的评价方式。

“莱顿宣言”的第三条原则特别提到，要保护卓越的本地

化的研究。研究的卓越不等同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英文论文。一些偏重于本国或者区域性的课题的研究，往往并不被知名的英文期刊所青睐。“只有基于高质量的本地语言期刊的指标才能正确评价和推动卓越的本地化的研究。”这高度契合了这次评估中强化国内研究论文地位的思想。

但“A类期刊”的取消仍有许多值得反思和总结的地方。无论如何，“A类期刊”的设定其本质依然是“以刊评文”，这是“旧金山宣言”所明确反对的。“以刊定质”，而不是用学术质量本身来评价科学研究，已经日益遭到越来越多人的反思、质疑、批评和抵制，这个时候又祭出这杆大旗，似有逆向而动之嫌。真正需要下功夫的是如何在同行评价和代表作评价方面拿出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而不是继续在“看刊物、数数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样只能带来更多的浮躁。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在主导此事，其“指挥棒的力量”不会随评估结束而结束，而会长久发挥作用。量化指标的推出在世界范围内几乎都是“民间”行为，鲜见教育行政部门直接推动设立。无论是从“管办评分离”“放管服”的角度，还是从落实创新发展理念、推进“两个一流建设”的角度，推出“A类期刊”都是弊大于利。（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政策研究室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光明日报》2016年7月12日 作者：严蔚刚）

从 QS 排行榜谈高等教育全球变化趋势

近日，第十三届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发布。通常，总会有些对此很感兴趣的人作排行榜的数据观察，而这种对数据的仔细检视，也的确可以让我们辨别高等教育现有格局和潜在的发展趋势。

也许今年最大的趋势是西欧教育界表现的衰退。法国、葡萄牙、德国和意大利的衰退程度各有不同，但西欧最重要的震动应该还是英国。

举例而言，剑桥大学从第三位下降到第四位就可能代表了一个小的波动，就如同伦敦国王学院跌出前 20 名一样。另外，在英国进入全球前 400 位的 48 所大学中，有 38 所都出现排名下滑，这种变化虽然小，但值得留意，这意味着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如今乌云密布。

然而，更具重要性的是参考每位研究人员的论文在全球被引用次数的指标。在这方面，剑桥大学在引用率方面出现下滑，这种不佳表现背后的意义相当重大。同时，英国进入全球前 100 位的机构数量连续第二年少于中国。西欧相关机构的研究力总体呈静态，但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正在快速进步，中国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丹麦、瑞典、比利时和法国的大学无论是声誉还是研究表现，似乎都在遵循着与英国大学不同的发展轨迹。

究竟发生了什么？就英国而言，脱欧是一个充分原因。几乎所有 QS 排行榜用于今年的排名的数据都是在 6 月 23 日

之前收集好的，而且许多指标都是跟踪记录了五年的数据。排名表明，这个国家严厉的政策也许正在输掉它的研究人员和学生。

今年增加给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 2000 万英镑，是 2010 年以来的首次，而且这还不足以弥补 2010—2011 学年以来的实际削减。再加上这六年来的通货膨胀，很明显，英国政府是在要求自己的大学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

在丹麦、瑞典和法国这三个国家中，丹麦和瑞典都与世界紧密相连，它们已经达到了欧盟的研究和发展支出目标，13 所大学中的 12 所的科研表现都取得了进步。法国则在看到本国科研在整体性和研究影响方面都双双下降，且遭到学术界的一片声讨之后，才决定违背之前要削减 200 万英镑教育开支的决定。尽管最后还是相当于削减了期待值的一半。

在美国，大学可以接受大量私人资金的捐赠，美国大学第一次包揽了 QS 全球前三名的宝座。巴西则在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衰退中勉力维持它的高等教育系统，尽管这一系统无论从资金还是从人口来看，都充满令人不安的不平等。今年，巴西每一所入围榜单的大学在研究质量方面都是连续第二年下降。

资助资金的减少不仅影响了 QS 的研究指标，也会影响其他一些指标。比如国际教师比率和学术声誉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国家提供世界一流的教学和研究的能力取决于它吸引优秀学者和海外留学生的能力。二者相辅相成。

比如在英国脱欧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指出，脱欧行为会潜在地影响留学生将英国作为留学目的地的意愿，而今年的排名也表明，英国对海外学者的吸引力正在下降。超过一半的英国大学在国际教员比例方面的分数出现下降——值得提醒的重要信息是，大部分用于排名的数据是在今年英国脱欧之前收集的。

在研究预算保持静态的情况下，我们很难预测英国大学今后在国际化方面的表现。学费方面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学生，而学者方面的不确定性则来自于国内外基金来源的不确定。

在排行榜中，使用大学声誉这一指标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决策者、未来和现在的学生以及大学的管理者，在了解全球学界当前的情绪方面都做得很好。到目前为止，QS的学术声誉调查是全球学术共同体的最大的情感汇总。

欧洲学术界有一堆烦心事，西欧超过2/3的大学也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很难忽视以下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日益增长的科研成果压力、被削减的预算、对看起来冷酷无情的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恐惧，还有那种认为西欧大学会日益充满压力且对它们赖以生存的学者正在失去吸引力的观念。（作者参与了QS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审计与分析工作，韩琨编译）

（《中国科学报》2016年9月21日 作者：杰克·莫兰）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国内态势

一、高校“双一流”建设背景及部分省市动态

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会议强调，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要引导和支持高等院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活力。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提出坚持以中国特色、一流为核心，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方向，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方案》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作出新部署，将“985工程”“211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求贯彻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创新重点建设机制，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6年6月，教育部宣布一批规范性文件失效，其中包含《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等“985工程”“211工程”以及重点、优势学科建设的

相关文件。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正研究制定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和配套政策，拟于今年启动新一轮建设。

自从国家启动“双一流”建设工程，各省相继启动了本省市的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浙江、广东、青海、山东、内蒙古、江苏等省份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出台专项政策，上海、北京、安徽、陕西、河南、福建等省市教育厅联合其他部门出台专项“意见”、“规划”等。

二、国内部分省市推进“双一流”建设主要措施

“双一流”方案牵动着国内每一所高校的未来规划和发展目标，多个省市相继制定了高水平大学打造计划，在各省市开展“双一流”建设实践中，主要做法如下。

一是投入巨资对接国家双一流计划

很多省份是大手笔不断，在高等教育上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重大投入，拥有一流的人才储备以及创造良好的氛围方面很多省份都已经走在了前面。如，广东省投入 50 亿遴选了 7 所高水平大学建设，并遴选 7 所高校进入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其中进入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高校每年都拿到了 3 亿元以上的高水平大学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产学研合作、人才队伍建设、科研服务与条件支持平台建设等。福建省把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 3 所高校列为高水平大学建设对象，从 2016 年起，省财政每年将安排专项资金 2.8 亿元，支持 3 所高校建设；同时，设

立绩效奖励资金，对学校取得重大的标志性成果予以奖励。河南省遴选了 17 所高校的 35 个学科入围优势特色学科建设计划，总体投入高达 31 个亿，而且正在遴选高水平大学和特色骨干大学。上海启动了高峰高原重点学科建设计划，并且明确在未来三年的第一阶段将投入高达 36 亿用以重点学科建设，并在第二阶段加大投入。北京在 2015-2016 年连续两年启动了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总体投入预计将接近 100 亿。江苏省对进入全国百强的高校，将给予每年 1 亿资金的支持。

二是以一流人才储备为双一流建设的着力点，补齐制约学科发展的短板，破解人才难题

建设高水平大学工程巨大，一流领军人才首当其冲，但优秀的中青年人才将影响高等教育格局的改变。广东省为破解高水平大学建设体制机制障碍，出台《高水平大学建设人事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提出“五个下放、两个完善、一个加强”的意见，即下放岗位设置权、公开招聘权、职称评审权、薪酬分配权、人员调配权，完善人员考核晋升退出机制、服务保障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目标是健全岗位管理、人员聘用、人才评价、人员流动和退出等制度，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并由省教育厅带队，16 所省内高校组团前往哈佛大学招人，招聘所涉及学科领域广泛。北京市规定高精尖创新中心投入的经费额度原则上不低于 70% 要用于国际创新人才的聘用、国内创新人才资源的整合。其

中，不低于 50% 的人员聘任费要用于国际人才的聘用，不低于 20% 的人员聘任费要用于京外人才的聘用。引进的国内外高端人才中，45 岁以下青年科学家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50%。安徽省推进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提出引进 2 个以上海外优秀人才和团队，大胆引进和培育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人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级教学名师以及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等国家级人才和团队。河南省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完善学科绩效评价机制和人才评价制度，创造吸引、留住、用好人才的政策环境，为卓越人才队伍凝神聚力、潜心治学提供保障。江苏省打造高端创新团队，采用柔性引进、项目引进、专项资金引进等方式，加快集聚国内外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才、创新团队。

三是加强对省域内高校布局的顶层设计，科学谋划建设方案，分层次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

上海出台政策直接指向学科发展与布局规划，并对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行整体规划；安徽指向地方高水平大学，提出分类发展；广东直接指向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上海已采用新的高校分类法，所谓“排排座”的现象被改为“一队变多队”，将高等院校按人才培养的多种类型区分为四大类：学术研究型（科学原理发现与原型验证）、应用研究型（技术原型验证与开发应用）、应用技术型（产品工艺开发）、应用技能型（生产加工技术）。传统的研究型大学与高职高专院校都

能当“头羊”——没有层次之分，只是类型不同。按照这样的规划原则，各类高校都能在特色发展中争创一流水平，乃至世界一流水平。安徽省地方高水平大学立项建设采取省级统筹和高校自主相结合，重点建设和全面推进相结合，整体布置和分类发展相结合的思路，分地方特色高水平大学、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地方技能型高水平大学三类进行建设。山东省以5年为一个建设周期，积极支持在山东的部属高校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工程，将重点扶持6所左右省属高校和20个左右优势学科，争创国内一流。内蒙古自治区建设4至6所国内一流大学，重点支持内蒙古大学率先进入国内一流大学行列，争取早日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江苏省提出重点支持2所左右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支持15所以上高校进入全国百强。

四是创新科研投入和资源配置，激发和释放科技创新的活力，打造科研“特区”

北京高精尖中心是相对独立的科研实体，将集中优势力量，突破一批关系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方向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前沿技术，将中央在京高校、市属高校和国际创新资源等多方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建立国内与国外创新资源深度融合、科研与应用相互促进、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央属院校与市属院校共同发展的长效机制。合肥将聚焦能源、信息、材料、生命、环境等科学领域，建设国际一流水平、面向国内外开放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到2020年合肥将建

成新型协同创新平台 10 个以上，研发转化科技成果 10000 项以上。上海根据一流学科建设方案，也分类建设“高原学科”与“高峰学科”，在“高原”之上再出“高峰”。北京大学-神州控股协同创新中心成立，将着力于网构软件与智慧城市的应用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打造一个引领国家网构软件和智慧城市技术发展的政、产、学、研国际核心权威机构，神州数码将累计出资高达 2.38 亿元，协同创新中心是开放式的，致力于与产学研界同仁共同打造一个产学研共同体。

五是引进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建立战略联盟，创新合作模式，加速推进一流大学建设

以建成世界一流的独具特色的综合性大学为目标，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举行了校园奠基典礼，学校的投入资金高达 19.6 亿元。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办学方式有许多的精心设计，在专业设置上，将选取莫斯科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的优势学科专业；在教学模式上，将中国培养模式、俄罗斯培养模式和博洛尼亚进程模式相结合；在办学宗旨上，提倡大学对社会的服务功能，面向全社会开放。成都市与电子科技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携手共建世界一流大学。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科技成果“三权”改革实践、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推动高校与本地企业协同创新、推动高校向创新创业型大学转型、推动建设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区、共建成都产业技术研究院等 6 个方面展开合作。中科院和河南省将联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在郑州建一所高水平

大学，河南省高等教育长期积弱的局面或许将得到一定的改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浙江省战略合作，将建立杭州校区，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建设北航杭州分校区、航空航天特色小镇等项目。北航杭州分校区将围绕浙江产业发展需求，开展教学、科研创新和重大技术攻关，培养创新人才，促进高新成果在浙江的转化和转移；围绕航空航天特色小镇，将设立航空基金，引领通航产业发展，布局“通航+”多元产业体系，打造航空航天科技产业园。为进一步推进西北工业大学在“三个陕西”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西北工业大学与陕西省发改委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共建世界一流大学。

（作者宋芳系中国教育战略学会副会长，教育之弦
2016-9-16）

“两个一流”：当利益遇到理想

从“集中力量办大事”到“两个一流”，一脉相承的是国家理想

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开宗明义，指明“两个一流”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制定总体方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因此，“两个一流”建设是国家战略，体现着国家的理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其实就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政策方向，目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积累办学经验。例如，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谈及院校调整指导思想时就指出：“有重点地稳步前进，不是不进和冒进，也不是齐头并进。”“办事情总要有个次序。先搞重点，其他就可以逐步带动起来。比如综合大学办几个像样的，其他的也就会跟着学。”在以后的发展历程中，应对国家建设的需要先后确立96所高等学校为全国重点高校，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后又先后开展了“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出后启动了“2011计划”。

长期实施的重点建设政策，犹如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起一支“国家队”，使得中国一批高水平大学经过长年积累而开始进入到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行列，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现代

大学制度和规律的探讨和认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在我国的“211工程”“985工程”实施之后，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也先后启动“精英大学计划”“21世纪COE项目”“21世纪智慧韩国”“创新型大学评选”，加上原来就有的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按学科对大学的科研评价及依据评价结果的“一揽子”拨款政策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对顶尖大学优先集中支持的政策取向。

大学身份、层次固化，“两个一流”面临着利益博弈

任何管理工作，都离不开“利益和理念”两个概念。

先说利益。管理是利益的平衡和调配，一项政策或改革，立意再好、再有道理，但只要触动原有利益格局，就会有反对者。这不是认识高低问题，而是利益得失问题。利益不仅仅是资金，还包括声誉。因此，渐进、增量式的改革容易进行，急剧、颠覆式的改革阻力较大。“两个一流”建设也是如此，经过过去长时期的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已经形成，利益、层次相对固化，改变建设方式自然要引发新的博弈。每一家都在算自己的盘子，A刊目录、学科评估、学科调整等无不牵动着大家的神经。

再说理念。管理中的争议有时来自于各方思想认识的不同，并不涉及利益纠纷。理通了，自然就气顺了；而理不通，则执行政策的难度就加大，各方就都希望摆摆自己的道理。可现在的问题是，大家的观点不同，各方的观点又都有相应的道理，怎么办？在当今这个多元时代里，许多认识并没有

截然的对与错，但却实实在在地不同甚至相冲突，而政策必须做出选择。这一点在高等教育的政策选择上尤为突出，比如，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就是多样化，因此水平与特色、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协同、创新与转化、研究与教学等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大理小理都有，莫衷一是。

需要明确的是，出现利益再平衡和理念不一致难题，是正常的管理现象，因为社会本来就是由复杂的个体及其关系构成。解决问题的出路不能在原有层面，而必须到上一个层面。“两个一流”建设的实施推进就需要超越大学自身的利益和认识，而提升到国家的战略和理想上来。

但是，就目前一些高校的应对措施所引发的争议来看，也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以学科调整为例分析如下：

为迎接学科评估，许多高校自主地开展了学科调整工作。应该说，这项工作完全符合国家总体方案中四项基本原则的每一项：是以学科为基础进行的、是瞄向支持最有“一流”潜质学科的、这些学科是长期积累的结晶、学科调整是一项改革，而且这项工作也完全是高校自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但是，进一步地分析，也能提出不少问题，如：为什么要调整？大部分是为了学科评估后的学科排名，即潜在、臆想中的一流学科“卡位”，动机过于功利；让相关学科都来支持最有希望脱颖而出的学科，虽说不是造假，但也并不高尚，行为过于功利，有悖大学精神，也伤害了相关学科教师的积极性；部分撤销排名相对靠后学科是为了降低全校学科基数，即申

报学科评估个数的分母，这也是应对学科评估的一种策略，依旧是功利行为。

笔者并不一味地反对功利，因为功利有时可以转化为动力，但必须反对过于功利。学科调整是必要的，只是除了关注该学科在全国的水平地位外，还要综合考虑它的发展趋势、前景，考虑它在全校育人、研究中的生态作用。另外，学科排名第一和第二、第三的差距究竟何在？既有评估指标设计的因素，也有学科方向特色的因素。这些问题都需要引起关注。

当利益遇到理想，“两个一流”该怎么办

“两个一流”是国家理想，因此，与国家理想一致的事情做，不一致的事情不做，这是大道理。相关大学需要超越本位利益和自我理念，以实现国家理想为担当，引领高等教育向强国迈进。

当然，这是“形而上”问题，我们还要回到具体和现实，即如何建设“两个一流”。

首先，是“两个一流”建设的原则。总体方案清晰地给出了统筹推进“两个一流”建设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以一流为目标，世界一流的指向非常明确；以学科为基础，学科的水平、特色是重点；以绩效为杠杆，注重建设效果评价；以改革为动力，最终落实在遵循教育规律、加强制度建设上。除了上述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在具体的操作中，还要附加上两条实施的细则。它们是：

第一，有助于推动高校健康发展。政策的结果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能是破坏性，应当促进发展而不能中断发展，而发展指的是健康、科学发展。因此，学校需要有整体规划，需要遵循教育和办学规律，构筑学科、学术、育人的生态联系和环境。当出现问题、争议时，需要把发展是否健康作为一条评判标准来对待，以保证学校的长期、稳定、科学发展。

第二，有助于实现高等教育强国。这涉及高等教育整体的健康发展问题，也需要有一个好的生态。“两个一流”建设的最终目标指向是高等教育强国，而高等教育强国绝不是个别大学和学科孤军奋战的事情，需要建立起一流的高等学校体系。当然，“两个一流”建设重点不是解决整个高等学校体系问题的，而是旨在培育领头羊和排头兵。但是，标杆的引领、示范、导向作用很重要，学科建设更是涉及每所高校，牵一发而动全身。竞争要有，但过度了就有可能诱发高校的发展路数走偏，因此合作和协同更重要。

其次，是如何实施“两个一流”建设。依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已提取到两个关键词，那就是一流和生态。一流既是目标也是我们要建设的对象，“非一流”学校不要有过高期待；而生态则是提醒我们要关注项目实施的溢出效应，既要保留过去重点建设的优势，规避已有的固化缺点，还能照顾到学科繁荣的群落成长特点。

由此看来“两个一流”建设需要对原来的“985”“211”工程有一定的继承性，利益格局不能变化太大，重点是突出国际

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减少照顾性因素；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示范性，让广大的高校看到特色办学、差异发展的希望，能够激发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活力和创造性。据此，笔者个人认为“一流大学”入围数可定为原来“985 工程”大学数量的一半，旨在集中精力、提高水平；“一流学科”涵盖的高校数是原来“211 工程”高校数量的一倍，旨在形成学科高原和特色建设。

具体而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数量在 20 名以内，包括 10 名以内的综合大学，突出综合实力和水平；10 名以内的特色大学，突出国家战略性、先导性产业发展需求。无论哪类大学，选择的标准是突出学术水平，满足国家利益，杜绝平衡照顾，它们要能在世界平台上进行比较。

“一流学科”建设涉及高校数在 200-300 之间，具体数目需要经过测算。在这里，高校数量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关键是每类学科选择前几名？目前我国有一级学科 111 类，都选第一名肯定是不科学的，不仅争议大而且破坏学科发展生态，而且前沿学科往往是交叉的。笔者在此提出的是差异化的学科点入选政策，即每类学科入选 6-10 个不等，这样全国共入选学科点 1000 个；每类入选学科内部也分为两级，各 3-5 个，第一级入选学科点的经费数量是第二级的 3 倍-5 倍，有繁荣、培育学科生态之意。

“一流大学”建设大学可重复参加“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也可以不参加，这涉及不同的政策设计。笔者个人的观点是

不重复参加为好，因为这有助于它们的自主办学，也减少工作难度，但该给的钱要给够，把一流大学建设经费纳入基本经费支出其实更有利于这类大学的发展。如果不重复参加，“一流学科”建设涉及的学科点数量就可酌情减少。另外，学科点的评选和建设经费拨付的额度是按学科进行的，但钱到了学校后使用的权限不在学科点而在学校，这有利于提高学校的统筹权、自主权和经费的使用效益，这也是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经验。（作者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

（《光明日报》2016年8月30日 作者：马陆亭）

终止高等教育“985”“211”工程，纳入“两个一流”建设 从“大者通吃”走向“特色取胜”

教育部日前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其中包括《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关于补充高等教育“211工程”三期建设规划的通知》《关于实施“重点特色学科项目”的意见》《关于继续实施“优秀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对此，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举是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做出的新部署，要将“985工程”“211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该负责人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对高水平大学建设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11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做出新部署，将“985工程”“211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求贯彻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创新重点建设机制，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目前，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正研究制定实施办法和配套政策，拟于今年启动新一轮建设。

针对于此，记者与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和云南大学高教研究院教授罗志敏进行了深度对话。

记者：为什么终止“985”“211”工程，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怎样的发展阶段？

马陆亭：首先要说明的是，“985”“211”工程等都属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有增有减是正常现象，这是由国家财政预算体制决定的。

终止的时代背景是项目、称号出现了固化，导致竞争力、活力、示范性减弱，影响项目效益的发挥。新中国成立以来，重点建设模式一直是我国高等学校建设的一大政策路径，从全国重点高校到“211”和“985”建设，在思路上一以贯之，而到“2011 计划”开始有所调整，是为了去除“千校一面”、封闭固化的弊端。我认为，此次国家将“985”“211”工程统一纳入“两个一流”建设的目的，与前者相同。

记者：“985”“211”工程在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马陆亭：“985”“211”不仅提升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而且也使一批高水平大学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名校。可以说，过去重点建设项目的积累，为我们今天开展“两个一流”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如何评价“985”“211”工程的得与失？

罗志敏：“985”“211”工程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我国高等教育影响最深远的两项政策。应该说，在当时我国急

于追赶世界高等教育先进水平、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但资源非常有限、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实行以政府对高校进行“身份认定”为基本特征的“985”“211”工程，很有必要。政府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意志”，以“中心—外围”的大推进战略，集中有限的资源，人为扶持少部分高校，通过一部分高校的快速的发展，进而带动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985”“211”工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随之凸显。其一，它导致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形成了难以改变的“差序格局”。这使得不同区域的高等教育、不同大学之间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其最终的结果是，那些处在高等教育系统顶端的大学永远没有被后者赶超的后顾之忧，而处在低端的地方高校则几乎没有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处境。其二，弱化了高等教育市场竞争。“985”“211”大学是在一轮又一轮项目认定的基础上，通过“资源配置的剪刀差”形成的，而非通过学术、教学上的相互竞争。其三，高校依附政府的倾向非常明显，使得高校缺乏组织变革和制度创新的勇气和意愿。

记者：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是调整结构、提升质量，在这一目标下，我们需要怎样的新一期国家工程，以带动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

马陆亭：去年，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了确切的时间表，包括三个

阶段的具体建设目标和五年一轮的建设周期。阶段目标在时间段、内容项上既是递进，又是并进的——既存在从行列到前列、从少到多的递进，又存在大学、学科和高等教育整体实力的并进。量变引发质变，最后形成“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局面。这说明，“两个一流”建设既瞄准高端，又对梯队有引领和带动作用，最终是为了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战略。这也有助于引导各高校寻求自己的办学目标，鼓励和支持差异化发展。

记者：当前，“两个一流”建设的核心工作是什么？将给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腾飞带来哪些影响？

罗志敏：“两个一流”建设的核心工作，应该包括以下两个层面：第一，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学科建设要面向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坚持特色发展战略，培养优秀人才。第二，以“办学绩效”为杠杆。要突出绩效导向，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要积极采用第三方评价，同时在资金分配方面更多考虑办学质量，特别是学科水平和办学特色。

这一政策要得到有效推行，其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多方面的。我们将从“以校为王”走向“以学科为王”。如今后的高校招生，一所“985”高校整体的录取分数线很可能还要低于一所普通院校强势学科的录取分数线。同时，我们或将从“大者通吃”走向“特色取胜”。如在办学经费方面，一所综合性大学所获得的国家财政经费支持很可能还赶不上一所单科性院校。

（《光明日报》2016年6月30日 作者：晋浩天）

“一级学科”能等同于“一流学科”吗

自从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提出之后，一流学科建设成为议论热点。但学科的界定与内涵究竟是什么？却是我们在讨论甚至付诸实施之时，首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教育部门以“一级学科”为评估和排行依据，高等教育界自然就把一流学科的“学科”等同于一级学科。但“一级学科”是否就等同于一流学科的学科界定，值得探讨和商榷。

一流学科到底用哪个标准界定

目前，关于学科的内涵与边界，大致有三个标准。

一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学科门类”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 13 个，每大门类下设若干一级学科，共有 111 个一级学科，一级学科下设上千个二级学科。

二是国际通用的 ESI 为《基础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英文缩写，是当今普遍用以评价大学和科研机构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的重要指标，ESI 设置的 22 个学科为：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经济与商业、工程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数学、综合交叉学科、物理学、社会科学总论、空间科学、农业科学、临床医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神经系统学与行为学、免疫学、精神病学

与心理学、微生物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植物学与动物学、药理学和毒理学。

三是自清末引进西学以来，在我国社会大众心目中，学科更多的是指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理科、工科、农科、医科这六大学科门类，在大学具体分为文、法、商、理、工、农、医七大学院。

那么，一流学科的“学科”内涵与边界到底是指哪个标准？在高校看来，学科的内涵是指“一级学科”，因为教育部是以“一级学科”为标准进行学科评估排名的。但是，由于一级学科的设置和资源分配、编制控制、职称评审等密切相关，不同的知识领域都有独立成为一级学科的欲望，导致我国的一级学科设置在不断增加，客观上加剧了知识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的分割。学科是人类知识的划分，如果一级学科的界定过窄过细，并不利于学科发展与适应社会需求。

显然，较广义的学科划分更符合高等教育规律，有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与科学研究水平，也更能发挥学科建设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作用。一流学科建设的目的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为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提供人才与智力支持，而不是单纯学科内部的建设事宜。一流学科建设需要宽广的视野看待学科与学科发展及其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关系。由此，笔者认为，一流学科建设的内涵应该在国际通用的 22 个领域与我国通用的人文、社会、理、工、农、医的学科之间界定“学科”的标准与内涵

较为合适。

一流学科要符合知识体系的本来面目

学科的广度与宽度有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高校的学院一般是按照一级学科为标准来设置的，由于一级学科设置的知识领域较窄，实际上我国高校的学院数量远远大于国际知名大学的学院数量，国际知名大学一般由 10 个左右的学院组成，而我国大学的学院数量一般在 20 个，甚至 30 个以上。

由于学院过多导致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知识分割严重，部分高校迫不得已在学院的基础上成立学部，意图扩大学科的覆盖范围，按照知识体系的本来面目与规律来培养人才。有的大学在学院基础上成立了人文学部、社会学部、理学部、工学部、医学部等比一级学科涵盖范围更广的组织体系，意义就在于能够突破现有一级学科的范畴，突破知识体系被分割的藩篱。这也说明我国的一级学科划分较窄，不符合知识体系的本来面目，也不利于按照教育规律来培养人才与促进科研创新。在按照一级学科设置学院和各个学科与专业因资源配置而导致高度分离的背景下，“十三五”规划提出人才培养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就显得具有重要的针对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校一直在强调办学特色的“特色化”与教学科研的“专业化”是不同的概念，二者之间不能画等号。许多人将办学特色、人才培养特色等同于人才培养的高

度专业化和学校学科的单一化，这是一种错误认识。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并不能单靠某一学科，而是要求有比较综合化的育人环境。因为任何一个专业的学生不可能只学习本专业的知识，他们必须具备一定的的人文素养、科学知识及与本专业相关的学科知识。

许多人把高校的办学特色等同于企业发展法则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这句话是企业竞争的法宝，如浙江省许多企业，靠生产纽扣、领带等单一物品而成为大企业，但这一条却不适用于高校发展，并且违背了高等学校的办学规律。因为高校不同于企业，也不同于科研院所。企业可以靠生产经营一种产品发展壮大，科研院所可以以一个学科专业为研究方向。但是高校却不能只办一两个专业。我们不能把大学拆为数学大学、物理大学、哲学大学、法律大学等等，而是要把这些学科聚集一起，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共同致力于培养合格人才。在欧洲的德国、法国，虽然科研院所研究实力很强，但它们都必须与高校联合招收研究生，因为高校具有多学科的学习条件和学校文化的氛围，而研究所却无法满足上述要求。

因此，高校的人才培养需要突破学科与专业的限制，目前高校成立比学院涵盖更广的学部是顺应规律的制度改革。由于学科对于资源分配与评估评价的“指挥棒”作用，从更高层面看，我们在建设一流学科时，应该考虑调整一级学科的设置问题，以顺应知识体系的本来面目与教育规律。

一流学科需要恢复学科的本来意义

学科涵盖知识范畴的扩大不仅有利于培养人才，同样也有利于科学研究与知识创新。

从学科发展的规律看，现代科学发展呈现出越来越综合化的趋势，同一学科群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不同学科群之间也存在联系，大学各学科是共生共荣的有机整体，科学研究是在学科交叉融合中发展的，最近 25 年，交叉性的合作研究获得诺贝尔奖项的比例已接近 50%。美国的学位统计划分为 7 大研究领域，除了传统的 6 个领域之外，2013 年归为“其他领域”的博士学位比例高达 66.0%，硕士学位比例为 25.7%，这反映了美国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情况。这提醒我们要以较宽的视角界定学科，以促进学科知识的融合创新。

更有必要的是需要恢复学科的本来意义。学科本意是对于人类知识体系的边界较为模糊的主观划分，是为了高等教育教学与科研的相对有序而出现的。在西方国家，有学科的概念，但并无学科建设的说法，更不会把学科作为评价评估的指挥棒与资源分配的手段。在我国，学科更是一种管理概念，一种管制的理念，学科被自我封闭、画地为牢，成为资源利益的地盘，成为分割资源与再分配资源的堡垒，成为计划体制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知识成长发展与知识进步的阻碍。从本质意义上，有必要淡化学科作为资源配置的依据与手段的做法，恢复学科的学术价值，促进不同学科知

识的融合与创新。

因此，在学科还是具有管理与政策特别是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背景下，我们更有必要界定好“学科”的内涵。一流学科的“学科”内涵应该远大于“一级学科”的广度与宽度，这样的一流学科建设才符合高等教育规律，才能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与科学研究质量，也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一流学科建设中，我们不应该抱守残缺、刻舟求剑，不能因为管理与评价的惯性与方便而忽视了学科发展的规律，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调整对于学科的认识，从而真正实现一流学科建设的宏伟目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

（《光明日报》2016年7月6日 作者：李立国）

中国大学对“世界一流”执念太深、焦虑太重

国人都说，都全球化时代了，我们不能再沉默，一定要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否则，会被日渐边缘化。面对如此宏论，我“欣然同意”，只是如何落实，实在心里没底。比如，什么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如何“发出”，还有这“声音”是否美妙，都没把握。不提别的，单说“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感觉上便是危机四伏。

在西方，大学已经定型了，路该怎么走，大致已经确定。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你可以发言，但说了基本上等于白说。而在中国不一样，你会发现，那么多读书人都愿意暂时搁置自己的专业，争相谈论大学问题，那是因为他们相信，大学问题还在自己努力的范围内，今天的“百家争鸣”，也许会影响到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

至于我个人，既研究过去百年的“大学史”，也关注“当代中国大学”。我心目中的“当代中国大学”，是着眼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之后，这15年中国大学所走过的路。我曾用了10个“关键词”来观察、描述、阐释这15年的中国大学。那就是：大学百年、大学排名、大学合并、大学分等、大学扩招、大学城、大学私立、大学改革、大学评估和大学故事。具体的我不想多说，就说一句：此前一千年，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后一千年，大学将继续展现其非凡魅力，只是表现形式可能会

有很大变化。至于中国大学，仍在转型过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勇敢面对。

“世界一流”的焦虑

当今中国，各行各业，最时尚的词，莫过于“世界一流”，可见国人的视野和胸襟确实大有长进。提及“中国大学”，不能绕开两个数字，一是“211”，一是“985”，而且都叫“工程”。在21世纪，培育100所世界著名的中国大学，这自然是大好事，可中国毕竟财力有限，于是政府做了调整，转而重点支持北大、清华等“985”工程大学。

其实，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办现代大学，就是从模仿起步的。一开始学的是日本和德国，上世纪20年代转而学美国，50年代学苏联，80年代以后，又回过头来学美国。现在，谈大学制度及大学理念的，几乎言必称哈佛、耶鲁，连牛津、剑桥都懒得提了，更不要说别的名校。俨然，大学办得好不好，就看与哈佛、耶鲁的差距有多大。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迷思”。过去，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拒绝比较，必定趋于固步自封；现在，反过来，一切唯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你的一方水土，这同样有问题。我常说，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各国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定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再说，“大学”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见的数字（科研经费、获奖数目、名家大师、校园面积、师生比例等）外，还得看其对本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及贡献。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说“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我这么说，并非否认中国大学——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的很多缺陷，只是不喜欢人家整天拿“世界一流”说事，要求你按“排行榜”的指标来办学。

我在好多文章中批评如今热闹非凡的“大学排名”，认定其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即便是老实人，拒绝弄虚作假，可你潜意识里，着力于生产“有效的”数字，必定扭曲办学方向。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好大学必须有个性，而你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差的大学可能得到提升，可好大学将因此而下降。这就好像辩论比赛，裁判称，按照规则，去掉一个

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的平均。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见，也可能是创见。当你一次次被宣布“工作无效”，不计入总成绩，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转向，变得日渐随和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固执己见，可那就成为“烈士”了。

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中国大学普遍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好处是举国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变；缺点则是不够自信，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其实，所有理想型的论述，在实际操作中，都必须打折扣。所谓“非此即彼”或“不全宁无”，只适合于纸上谈兵。

今天中国，不仅仅是“开放”与“保守”之争，在“接轨”与“闭关”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第四条路可供选择。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很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连标榜“独立”与“创新”的大学，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

“教学优先”的失落

我之所以对各式排行榜心存忌惮，很大程度基于我对大学功能的理解。在我看来，大学不同于研究院，即便是研究型大学，“教书育人”依旧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关注的是心智，而非专业技能。而所谓“心智”或“精神”，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

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到各种硬指标上。

自从有了“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加上各种“排行榜”的诱惑与催逼，大学校长及教授们明显地重科研而轻教学。理由很简单，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的好坏，无法量化，不直接牵涉排名。不管是对教师的鉴定，还是对大学的评估，都是“科研”很实，而“教学”则很虚。其实，当老师的都知道，在大学里教好书，获得学生们的衷心拥戴，很不容易。我说的，主要不是指课堂效果，因为那取决于专业、课程、听众以及教师的口才等，更重要的是用心教书，对学生负责，以及真正落实教学目标。今天中国大学，教授们普遍不愿在学生身上花太多的时间，原因是这在各种评鉴中都很难体现出来。这是一个很糟的结果。我甚至认为，高悬“世界一流”目标，对那些实力不够的大学来说，有时不啻是个灾难。这很可能使得学校好高骛远，挪用那些本该属于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资源，投向那个有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幻境。结果呢，连原本可以做好的本科教学都搞砸了。

这让我想起西南联大的故事。今天，大家都在怀念炮火纷飞中联大师生的“笳吹弦诵”。毫无疑问，这个生存在战争年代的大学，“生产”了很多著名人物，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还有众多两弹一星的元勋。但请大家注意，联大校友中，理科方面的著名人物，绝大多数都留过洋。事实上，西南联大最大的“学术成就”，是成功的本科教育。

现在大家谈西南联大，有点过高估计了他们的学术水平。

杨振宁、何炳棣都再三说，西南联大的学生到美国念研究院，比美国最好的大学一点都不差。这话有道理，但必须加注。当年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和美国著名大学之间，是有较大落差的，问题在于，培养出来的学生，差距并不大。原因是什么？第一，大学经费有限，无力发展研究院，西南联大九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总数不超过一百，还没有今天一个院系一年培养的多。第二，因实验设备等实在太差，教授们没有能力从事专深研究——我说的是理工科。因此，无论校方和教授们，全都专注于本科教学。我翻查了很多史料，包括当年的各种教材、教师薪水表、图书馆资料、仪器设备，还有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等，确认西南联大的学术环境实在很糟糕。可另一方面，当一所大学的所有著名教授，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学里面，这个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水平一定高。

回过头来，看日渐成为神话的西南联大，确实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包括吴大猷教授如何发现李政道，扶上马再送一程。根据杨振宁回忆：“当时，西南联大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而同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非常认真。”李政道则称：“他们看见有一个优秀的学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养的。”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理解是，除了教书育人的共同理念，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没能力大规模发展研究生教育，没条件强调学术成果，这一缺陷，反而成全了西南联大的本科教学。

而今天，中国的大学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本科生身

上，这是今天中国大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这其中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在大学里教书，只有论文或著作才能体现你的学术水平。加上很多不太自信的大学，会把每年发表多少论文作为一个硬杠杠，那就更促使老师们不愿意在本科教学上用心了。

所谓“教学”与“科研”可以互相扶持，且相得益彰，我认为，那是一种“理想状态”，缺乏实验数据的支持。确实有既长讲课又擅科研的，但即便是如此完美的教授，其备课、讲课及辅导学生，同样会影响科研工作——毕竟，我们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时。而更多的教师则是学有偏胜，或长于教学，或长于著述。假如我们认定，大学的核心任务是“教书育人”，那么，如何让长于教学的教师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硬逼着他/她们去写那些不太管用的论文，是个亟须解决的难题。在我看来，大学教师的“育人”，不仅是义务，也是一种成果——只不过因其难以量化，不被今天的各种评估体系承认。

“提奖学术”的困境

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大学——尤其是“985”工程大学，可利用的资源会越来越多，可随之而来的是，工作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很穷，但有很多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供你潜心读书做学问——那是最近三十年中国学术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现在不一样了，诱惑很多，要求大家都“安贫乐道”很不现实。以后呢，收入还会逐渐增加，但工作会越来越忙，忙得你四脚朝天。我们必须适应这

个变化了的世界，但不一定非“随风起舞”不可。对于大学教师来说，单说“支持”而不讲“责任”，那不公平。我只是希望这种压力，不是具体的论文指标，而是一种“氛围”，以及无言的督促。现在都主张“奖励学术”，可如果缺乏合适的评价标准，奖励不当，反而徒增许多困扰。必须逐步摸索，建立一套相对合理的考核与评价体系。

我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及中国的学术著作出版那么多，但绝大部分都是半成品。说“半成品”，意思就是，立意好，作者也下了功夫，但火候未到，还没打磨好，就急匆匆出来了。之所以“精品不精”，背后因素是市场的诱惑，剥夺了学者们本该有的从容、淡定和自信。以我的观察，最近三十年，好的人文学方面的著作，大体上有三个特征，第一，个人撰写；第二，长期经营；第三，基本上没有资助。强大的经费支持，对人文学者来说，不是最关键的，有时甚至还坏事。为什么？因为拿人家的钱，就得急着出成果，不允许你慢工出细活。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再拷贝到人文学。延伸到社会科学，还有道理，最不适应这套管理机制的，是人文学。

现在提“奖励学术”，都说要以课题为主，尤其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我不太同意这一思路。如果是奖励人文学，我主张“以人为本”，而不以工程、计划为管理目标。原因是，人文学的研究，大都靠学者的学术感觉以及长期积累，逐渐摸索，最后才走出来的。还没开工，就得拿出一个

完整的研究计划，你只能瞎编。如此一来，培养出一批擅长填表的专家，学问做不好，表却填得很漂亮。而且，我们还以项目多少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我建议改变现有的这套评价体制。

外面传说，北大有一个规定，两个人同样评教授，一个人有课题，一个人没课题，如果成果一样，那就应该给那没课题的。因为，没有政府的经费支持，还和你做得一样好，可见他的学术水平更高。这属于美好的误会，北大其实没那么“另类”。最近学校开会，还在提醒我们尽量争取课题。只不过，北大的教授们，确实不太愿意申请各种各样的课题，越有名的教授越是如此。我的建议是，允许学者不做课题，但出了成果，摆在那里，请专家鉴定，真好的话，你说吧，值多少钱，10万、20万、50万，你给我，我继续做研究，至于怎么做，我自己决定。在国外，也有这种情况，奖励你科研经费，后面的活，你自己做。这样的话，什么时候发论文，什么时候出书，我来把握。现在的状况是：按工程进度，一年或三年，必须结项，做不出来，你也必须硬撑，送上一堆夹生饭。对人文学者来说，每天忙着填表，不是好事情。

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一文中，我曾谈及，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最大危机，很可能还不是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在大学中地位急剧下降，而是被按照工科或社会科学的模样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经过这么一番“积极扶持”，大学里的人文学者，钱多了，气顺了，路也好走了。可没有悠

闲，没有沉思，没有诗意与想象力，对于人文学来说，这绝对是致命的。原本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个人品味、擅长沉潜把玩的“人文学”，如今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实在有点可惜。在我心目中，所谓“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但在一个生机勃勃而又显得粗糙平庸的时代，谈论“精神超越”或“压在纸背的心情”，似乎有点奢侈。（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新华网 2016 年 7 月 6 日 作者：陈平原）

张尧学：大学究竟该办成什么样子？

编者按：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院士一直以来对高等教育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他的很多精彩讲话内容被广为传播，本文为张尧学院士在中南大学“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会议讲话中关于“大学究竟该办成什么样子？”的部分内容。

下面，我讲讲关于“大学究竟该办成什么样子？”的一些个人想法。

第一，我觉得大学还是要多一份安静和悠闲。

现在我总感觉太累，我不知道你们累不累，反正我感觉很累，来自内心的累。陶渊明讲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是种理想的生活。过去的读书人，只要不做官，有饭吃，这种生活过起来还是很容易的。现在的大学，从教授、副教授、学生、管理人员，人人都太累。我想我们能不能建一所有一份安定和悠闲的大学？有的人可能会说：有那么多指标要发展，哪来的安静和悠闲？其实呢，我建议有些指标不要太当回事，当然大的指标与钱有关的那还是要重视，其他指标就无足轻重了。落后就落后，批评就批评，只要不犯错。

怎样才能过安定和悠闲的生活，关键还是靠建制度和执行制度。我现在累是因为有很多遗留问题要处理。比如有些七八十岁的老同志还去人事处要求评职称呢。前几天有位老太太，已经是第三次找我，要评高工，她就是不服气，说水平比她还低，还有曾跟她同样情况的人退休工资比她还高，

结果去人事处打工资单，一看人家已经是副高、副处了，但她不是。她非要与她同时间同批参加工作的同志比！这就是人的思想观念给带来的事。

再说一个事，我们有些土地的遗留问题处理完了没？没有。因为这些土地出让时压根就没有向教育部、财政部报批。现在土地没有了，但是账还在那，账上那片地还是国家的！但实际上没有了。

为什么不能安静悠闲，就是原来没按规矩来。最近，教育部有关部门正在学校清查国资，有些问题一查就出来了。要我们怎么去说啊？国家资产划到哪去了呢？这种遗留问题处理起来又难又费劲。所以，我们办事还是得按规矩来，不按规矩来，学校就没有教学科研的安静与悠闲。把学校办得有一份安定、有一份悠闲，就需要大家讲规则，讲程序。在规矩、制度的框架内，大家不犯错，拿着还不错的工资，让书桌安静下来。那“唐宋八大家”的时代就有可能出现了。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座谈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我们学校也组织学习了，意义深远。卓越的思想一定是在自由的状态下产生的。你别看毛主席在红军长征路上那么紧迫，三渡赤水四渡金沙江，但他仍是保持悠闲的。在他最困难时，他还能问鱼儿在水中是怎样睡觉的？还会问刘伯承同志和小叶丹结拜兄弟时是先跪左腿还是先跪右腿？毛主席是一个思想自由的人，并且越紧张时他越悠闲。他是在天马行空、思想自由这种悠闲镇定的状态下出东西，

并不像我们，像鸭子般一会儿被赶到这一会儿赶到那里。所以大学要办出一份安静和悠闲，要能让我们一线的教研人员有自由的思考空间。如果我们大学一线的教研人员连自由的思考空间都没有了，一天到晚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去挣钱，为了评估，这是有很大麻烦的。

第二，大学要给人留一份自尊和自信。

做一个大学教授是一分光荣的职业，是一个值得珍惜和维护一辈子的职业。我们的领导班子是为大家服务的，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好的环境——生活保障、人身安全和学术自由。我们反对校园内人攻击人、人打压人、人欺压人的现象，特别是在学术上！但你自己要有自尊，要自己看得起自己。首先自己要认为自己是这个领域最好的。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还能干什么呢？同时，你也不要想坏事，干坏事，要对得起知识分子几个字。尽管我有时批评湘雅的同志，其实我还是觉得湘雅了不起。但我为什么要批评他们呢？因为他们老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差，这样怎么能进前三呢？我说，就是要有勇气有胆量，要相信湘雅是全国一流的，甚至在一流也是在一流的，这样才能争到前三去。自己都认为“我们怎么能行？能进前十就不错了”，那你永远都只在前十。要有自己就是一流的、自己就是这个领域最好的意识。要是没这个认识，想把湘雅或学科争进前三那是不可能。因为人是有惰性的，会自甘堕落。所以我们要有一份自尊和自信。

学校的考核制度是给大家提供了这个保障的。我们的考

核，并不是要让那些不出成果的人会活不下去，当然出了成果的人会有额外的奖励。对那些没出成果的人，也要让他生活得有体面。钱多当然好，但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没意思了，当然没有钱也是不好的。钱多了，无非是银行账号的数字后面不断地添零。你看邵逸夫、李嘉诚等最后都在往各处捐钱。当然我们也希望中南大学的毕业生、有钱的老师也可以给学校捐钱。但是这里我要说的是，其实钱不是最重要的，不要掉到钱眼里去了。在大学里做事，还要多做一点学问。最近，河北科技大学出了个叫韩春雨的，十来年没有发论文，最近发了篇基因编辑的论文，大家说很不错，相当于“诺奖级”成果。根据学校现在的制度政策，有段时间你不发表东西是可以的。我们教授论文发的多，当然奖金多些。没发论文，也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没发文章时只要你完成些教学工作量，我们现在给的工资在长沙也绝不会寒碜。在这么好的待遇下，静下心来多读读书、做做研究、写写文章。写得好就发，写得不好就暂时放在那，再研究、再改，多好啊！我劝大家不要做行政领导。做行政领导会耽误大家许多时间。要经常讲一些没有多少用处的话。我自己就是这样，现在每年毕业典礼、开学典礼总要讲话，如果讲一次能管几年、放录音多好！

第三，在大学还是要保留风骨和思想。

风骨并不是指反对一切、批评一切，而是应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正义感，要有深入思考，然后以中肯的方式表达你

的见解和批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就无法进步。包括我在内，大家尽管给予批评，我很愿意听大家的批评意见。最近有人反映在校园里安减速带有问题，这里特别说明下，学校车速过快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万一有个小孩冲出来刹车刹不住怎么办啊？撞死了是要去坐牢的。这都是次要的，被撞孩子的家庭怎么办？大家想没想过？所以这是以个人的一点点不舒适换得大家的安全。大家有意见没关系，批评归批评，但总的出发点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希望大家理解。对于批评和提意见，我们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但提意见的同志也不要一看意见没有采纳就生气，就闹。这不是风骨。大学要有点风骨、要有思想和正义感，要多想点事，人不想事脑子就会越来越生锈。

前些天遇到一个原来在长沙理工大学做教授的同志，他问我觉得在学校做老师好吗，现在大学教授有水平吗？他说自己在大学里读到博士并工作成长为大学教授。但感到自己的思想越来越狭窄，越来越与社会脱节。因为与外面世界接触少，人也变蠢了，话也不会说了。最后他决定从大学调出去，走入社会。当然这是他的感受。大家的感受是什么？一个人如果只局限于大学校园里，又不看书学习，会有以下毛病：一是没事爱说闲话，鸡毛蒜皮的事总在说；二是爱告状。以上现象我们现在好多了，学校的正气在上升，大家都在往事业上去奔了。大学要引领社会，不要隔绝于社会。大家可以多读书、多思考，通过书本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和分

析世界，从而得到自己的思想。大家也要多实践，多出去走走。

我想我们要建一个比较安静悠闲，拥有自尊和自信，勤于思考且富有正义感的大学，这是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学校。至于创新、人才培养等其他方面的事项，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就能迎刃而解。要达到这个目标，仅仅靠思想教育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制度保证，同时要坚决地执行这个制度。制度制定容易但是执行却非常难，有人说改革要流血，其实改革要流血就是在制度的执行上。我们学校实际上抓了不少人，因大家碍于情面，没有广为宣传，可不进行宣传教育又起不到警示作用。这就是改革推行步履艰难的主要原因。比如说机关裁人，机关有 700 多人，大家还反映人少了。我看裁掉 300-400 人，工作照转。但是学校没有裁人权，一个也裁不了。大学的改革难，比国企难多了，因为完全要靠大家自觉，只能是凭借一些措施让大家一起共同成长，大家都凭着知识分子的良心来把事业往前推动。

不知你们听说过这个理论没有？太阳是恒星，之后就变成白矮星，白矮星之后就变成黑洞。太阳过五亿年变成白矮星，就不放射光芒了，那时地球就进入黑暗时代；又再过五亿年，白矮星就变成黑洞，地球就被吸入黑洞了。我想，五亿年以后地球都会没有了，我们何不多思考一些问题，让我们更加智慧、更加快乐呢？

（青塔网 2016 年 7 月 3 日）

什么是“伟大”的大学

最近，北京大学关于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考报告提纲在网上流传，报告不仅提出要把北大建设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要把北大建设成为一所“伟大的学校”，并指出今后5-10年，是成为一所伟大学校的关键时期。报告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许多网友为北大的理想喝彩，也有网友疑惑地问，“5-10年建成，成为一所伟大学校是砌墙吗？”那么，什么是“伟大”的大学？

“伟大”和一般理解的“世界一流”不是同一个概念

从词义上来看，“世界一流”是个分级概念，就是把同一种类型的事物分成若干个级别：一流、二流、n流；要分级就需要对不同的个体进行比较，就需要标准和各种指标，就需要计算，多一分排在前面，少一分排在后面，非常清晰，所以“世界一流”几乎是若干标准和变量的聚合体，可以被比较，可以被测量。这也是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人们目前理解的“世界一流大学”是由各种各样的大学排行榜规定的。正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说的那样，“对全世界大多数大学来说，跻身排行榜前列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证据。”显然，与“世界一流”相比，“伟大”是一个更模糊也更具有精神气质的词语。“伟大”很难被测量，很难被比较和分级。它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用在大学上，“伟大”更多的不是指事功，而是指精神气质。总而言之，“一流”是标准，“伟大”在于品格。

在许多中国知识人的眼里，1919年的北大已经是一所“伟大”的大学，尽管她那时候年轻，只有21岁；规模小，只有大约2000名学生；设备简陋，没有几个像样的实验室；更谈不上在教学科研上处于世界前沿。与同时代的欧美大学相比，她显然不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但她是一所“伟大”的大学，她拥有特别的精神气质，她提出的“民主”“科学”引领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感召了近百年来中国大学。

与一些著名的美国大学相比，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在中国的名气并不那么大，在2016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中被排在第28位，在她前面还有20所美国大学，但她或许比排在她前面的不少美国大学，都更称得上“伟大”。从1848年创建之日起，她就明确了州立大学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她提出的“威斯康星理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推动美国大学形成了社会服务这一功能。

荷兰的特文特大学几乎缺乏成为一所好大学的所有条件，她20世纪60年代才成立，地处偏僻的乡村，经费缺乏，规模小，到现在学生也不过1万人。或许正是恶劣的环境赋予了她变革的意识，她用创新的理念运行大学，成了欧洲创业型大学的典范。与一些大型综合性大学相比，特文特大学的规模太小了，很难成为各类排行榜的宠儿，但没有人参观这所大学后，不认为她是一所伟大的大学。

不仅是中国、美国、荷兰这样的国家，不少中小国家，

在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了不少伟大的大学。这些大学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精神层面。就具体成就而言，她们一般都能满足以下两项条件中的一项或两项：或是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人类文明和民族进步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或是在高等教育的理念发展、模式创新上起到了引领作用。她们的贡献更体现在精神层面：她们一般都有着超越性的理想，并能以一种纯粹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践行理想。她们的成就，往往是理想主义照耀的产物。她们有的看上去是特立独行的，却不会因为任何其他诱惑背离高等教育和学术发展的根本规律。这些大学，可以是目前大学排行榜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可以不是，但在人们的心中，她们就是伟大的大学。

排行榜上的一流大学可以建成，伟大的大学只能靠涵养

现在，我国高校正在积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在这一进程中，很多人将其理解为建设排行榜意义上的一流大学，认为它是各种定量指标堆砌的产物。事实上，各大排行榜使用的一些主要指标，比如教师学生规模、顶级刊物、论文发表的数量和引用率、论文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的数量等等，这些都是量化指标。什么东西只要一经量化，基本上就可以购买，就像氧气和水。自然界的氧气和水是免费的，也是无价的，但一经装到瓶子里，就被量化，就可以购买。学术也是如此，一旦变成 GDP，被量化，就可以被购买。上述指标，都可以通过花钱引进科学家、培养发文专业户来提

升。从这个意义上，排行榜上的一流确实是可以像砌墙一样砌起来，只要你肯花成本。

但是“伟大”不行，“伟大”没有办法量化，没有办法购买，所以也没有办法靠堆砌而成。“排行榜上的一流”可以使用现代的营销手段，“伟大”只能靠口碑。“排行榜上的一流”一定要紧跟时代的标准和脚步，迎合各类的排行榜；“伟大”却绝不跟风随同，有时甚至要逆势而行；“排行榜上的一流”往往是繁华的，而伟大的大学有时却要忍受寂寞；因为是按照一定的指标评价，“排行榜上的一流”常常是标准化的，属于同一种模式和类型，但伟大不同，伟大的大学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总是有着自己的特色。

“伟大”作为一种精神气质，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学术抱负和人类良知，只能靠涵养而成。涵养和建设不同的是，涵养没法规划，没法设立阶段性目标和各种推进工程。涵养是让一所大学处于一种像树一样的自然生长状态，只需要选择合适的种子，提供合适的土壤、阳光和水，她就会自由地生长。

片面追逐排行榜意义上的“世界一流”，让有的大学离“伟大”越来越远

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在一个崇尚科学和知识的全球化时代，是一种必然。通过对一些学术卓越大学的共同点进行揭示，来为其他大学提供标杆和学习的典型，对推进人类社会高等教育和知识创新的水平，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实

际情况是，当今世界对“世界一流”的追逐已陷入对排行榜意义上的“世界一流”的片面追逐，让有的大学离“伟大”越来越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各种各样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正在吞噬“伟大的大学”。

在评价“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应运而生，这些排行榜对大学甚至对不少国家的高等教育，影响都是巨大的，带来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各种调整和合并。以法国为例。在 2003 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中，法国居然没有一所大学能跻身前 50，这对素来为传统骄傲的法国高等教育界是当头一棒。为了在这类排行上获得更好的成绩，法国政府加快了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其中一个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建立高等教育研究集群或联合大学。也就是法国在研究世界大学排名后，发现大学规模小、专门化程度高是个很大的劣势，因而以研究集群或联合大学的方式对原有的一些教学科研机构进行整合。研究集群/联合大学之间的合作有的密切有的松散，但有个要求是一致的，就是各成员机构的教师和研究人員发表文章都要加上研究集群/联合大学的名义。从 2007 年推动以来，到 2013 年法国已经成立了 23 个这样的联合体。最有名的包括由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法兰西学院、巴黎高等化学学院、居里研究院、巴黎多芬大学、巴黎天文台等十家机构组成的巴黎科学与文学联合大学。排行榜的威力如此巨大，真是让人不胜唏嘘。这样整合后的排名增长，不知与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实际增长，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排行榜对中国不少大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有的大学在学科建设上，自觉地以此为指挥棒。对那些具有“排行榜生产力”、有利于提高自己名次的学科高度重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罔顾自己的学科传统和社会的实际需要，一些不具有“排行榜生产力”的基础学科和小学科常常受到冷遇。在人才评价与考核上，也是如此，一些大学片面重视科研发表和论文的引用率，许多教师也因此沦落为“排行榜生产力”的“包身工”，不再能享受到教书育人的乐趣。在最近《光明日报》发表的《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使大学深处危机》一文中，作者认为“全球大学排行榜和科研评估体系极大地狭隘化了大学的传统使命，绑架了院校个性化发展的机会，粗暴地掀起了知识量产、校际攀比，甚至国际竞争运动”，因而扭曲了高等教育的根本宗旨，直接导致了教学和社会服务等功能的边缘化。

对排行榜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片面追逐，在相当程度上催化了大学校园里的浮躁。我们在对如何提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国际竞争力这一主题进行访谈时，不少学者对当前中国一些高校的环境和学风表示忧虑。有学者认为：“中国学者面临的思想生产条件应该是晚清以来最好的，但是人的心态的浮躁程度好像是晚清以来最差的。精神状态和物质满足好像成为一种矛盾。”以这样的方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很容易就离“伟大”越来越远。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涵养“伟大的品格”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具有高水平高等教育的体现，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知识创新能力和文化软实力。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一个知识时代，应该也有能力建设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但绝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排行榜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政府在历次的重点建设和去年的“两个一流”建设文件上，都反复强调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强调要对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就是指我国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是既有学术生产力，又能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文化进步上发挥引领作用的有自己品格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有着自己的高格调和精神气质，而不是成为被各种排行榜绑架的缺乏灵魂的指标堆砌物。

所以，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仅是在各项学术指标上有着卓越表现的大学，而且是同时善于涵养“伟大品格”的大学。在追求学术卓越的同时，她们有着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和纯粹的学术抱负；她们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更是社会文化的引领者和人类良知的捍卫者。她们的目标不是成为各类排行榜上的座上客，而是人类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丰碑。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才能称得上是“伟大的大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2016年9月20日 作者：胡娟）

发送范围：校领导、学校中层领导干部

中国计量大学发展规划处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源街 258 号

邮政编码：310018

网 址：<http://fgc.cjlu.edu.cn/>

电子邮箱：zhanguoli@cjlu.edu.cn

办公地点：明德北楼 403 室、410 室

联系电话：0571-87676156
